

19世纪俄国革命道德原则的变迁

周厚琴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系, 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19世纪俄国革命经历了贵族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三个阶段,每阶段革命运动的目标与手段始终随主导阶级的道德原则而发展变化,使俄国革命在温和与激进、人道与恐怖的矛盾斗争中曲折前行。道德原则赋予了革命正义性,革命的结果反过来验证革命道德的价值,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了解到另一部俄国革命思想史。

关键词:俄国;革命运动;目标;手段;道德原则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2-0057-03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2.015

Changes of the Moral Principl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ZHOU Hou-qin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revolution had three phases: the aristocratic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s and civilians movement and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with their aims and methods varying with the different moral principles of the dominant classes. This made Russian revolution zigzag forward between mildness and radicalism, and humanism and terrorism. The moral principles rendered the revolution righteous, and in turn the result of the revolution tested the value of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the revolu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learn a different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thought.

Key Words: Russia; revolution; aim; method; moral principle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社会意识。道德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经济发展能够引起人们的性情、精神活动以及道德要求的变化。每一种社会制度下都会产生各种的社会思想,总会有一些人描绘另一种体制下的社会,期望在那里实现全人类的道德准则。当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成熟时,社会中的活跃分子就会对这些矛盾作出反应,开始批判现有的社会体制。于是那种描绘中的社会便成为革命理所当然的崇高目标。而一个阶级、社会团体的革命程度和手段取决于其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历史上无数的改革与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定律下进行的。

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总是要求改变现有的习俗道德。对习惯的物质关系的破坏必然影响到参与革命的人们的意识

和行为。破除了旧的一切,革命各派成员都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理念,他们把社会变革看作改变社会风尚的工具。革命道德原则的改变亦是必然:第一,批判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指出导致社会恶习的原因;第二,提出新的精神规范,用来代替已有的官方道德原则;第三,对革命家本身提出了道德标准,要求他们进行自我改造。

列宁把俄国解放运动史看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更替——贵族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三代人所奉行的革命道德原则也不尽相同。

一、十二月党人:不让人民流一滴血

俄国革命运动史开始于十二月党人。1812年战争暴露

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参加卫国战争过程中贵族先进分子看清了现实农奴制的罪恶。十二月党人的纲领文件体现出改变农奴不平等地位、推翻专制的愿望。他们担心国家的命运,试图寻找彻底改变社会生活的可能途径。如列宁的说法,十二月党人是第一批革命家,“为了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生活,并纯洁出身在不公正和奴颜婢膝世界中的孩子们,他们自觉地面向死亡”^{[1]255}。

十二月党人第一批纲领文件中,幸福协会(1818年)的一个条令指出,协会的目标在于达到普遍的幸福。它确定了加入协会的成员必须具备的特点:他们对祖国的态度,对善者和真诚者的态度,对恶与不道德的态度。它传递了贵族革命家应该坚守的道德原则。这一条令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一个革命道德规范的汇集。幸福协会的条令要求成员“在同胞中传播道德和教育的真理准则,以促使政府带领俄国走向伟大而幸福的阶段”^{[2]241-242}。

贵族革命家如此关注道德是因为他们将国家的幸福直接依赖于人民的道德。“不树立美德,任何政府、任何好的法律也无法使其免于失败。”^{[2]240}如果人民没有善良的道德,政府不可能克服笼罩着的道德败坏、无知、受贿、卑鄙、伪善、轻视祖国、冷漠、利己主义等。十二月党人很高地评价公民的个人品质,认为它是寻求一切幸福的第一自然原则;如果有悖于公共利益,任何个人目的都不可能是正当的。在条令的

态度上,评价其行为时也首先提出要效劳祖国。应尊敬那些有益于国家、是祖国真正儿子的人;蔑视那些逃避自己义务、有恶习的人。卑鄙、不道德、有伤风化的人是不被接受入盟的。贵族革命第一次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道德纯洁问题。他们在俄国解放运动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伟大构想只能以纯洁的手段实现。

成员有责任以榜样、语言和书信等方式宣传协会所采纳的原则。幸福协会成员的道德品格不仅体现在对社会责任履行上,还体现在对家庭义务的承担上,以及同狡诈之人的积极斗争,拥有高贵的心灵、善良和爱,会合理利用时间等等。参与幸福协会使成员“无论在意念还是在重要的甚至是不重要的事情上都高于那些无忧无虑而无知的人”^{[2]265}。成员的类似高尚行为为其他人提供了模仿的好榜样。这对年轻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没有特别的生活经验,可能接受坏的,也可能接受好的,革命者树立的榜样能使他们明白世界的价值所在。

幸福协会的条令中人道主义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十二月党人认为,协会的社会变革是要关注青年的教育,关心无助的人、无能力以劳动养活自己的人(特别关注军队服役的、为祖国经受苦难的人)。为祖国效劳,幸福协会成员试图努力建造一堵既是现在的也是未来子孙的道德之墙。

二、平民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与牺牲他人的博弈

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平民知识分子运动。此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把农民从农奴制压迫中解放出来的1861年的改革,激活了俄国社会的先进阶层。农民运动范围扩大。封建农奴体制的危机、克里木战争中沙皇政府的失败、革命形势的成熟,改变了俄国革命者的看法。如果说贵族革命家离人民很远,准备与地主达成协议,那么平民知识分子则离人民很近,他们首先依靠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运动力量,承认人民大众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要求有利于人民的广泛社会变革,取消地主的土地控制权。俄国解放运动中的平民知识分子阶段不再是个别英雄的行为,而是俄国社会广泛阶层共同参与的革命运动。他们建立了许多革命小组、秘密组织,都把筹备农民起义作为革命目标。

正是这个阶段在俄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所谓的“职业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新人”中有一特殊人物——拉赫梅托夫,对他而言,服务人民及社会利益是内在的需要,是其生命里的主要事业。以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名义,拉赫梅托夫自己放弃了很多:豪华、舒适和爱情。这个人按道德原则生活,完全为革命事业服务。他对普通人民的态度,对劳动、对物质方式的态度以及追求知识——所有

和系里的干部很努力。

波兰起义(1863年)被镇压后的十年里大众革命的积极性出现减退,这在平民知识分子运动中有所体现:发动人民走向革命的尝试变成了密谋的策略,开始倾向于恐怖活动或弑君行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道德纲领体现了他们革命活动方向的改变,它决定了革命者的行为。1869年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的创建者涅恰耶夫建立了自己的革命道德原则方案(《革命者手册》),其整个内容被马克思、恩格斯收录在论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

从巴枯宁同赫尔岑与奥加廖夫的通信中可以了解到,逃亡日内瓦的涅恰耶夫作为一个能干的精力旺盛的人,热烈地献身事业,开始引起了巴枯宁的注意。但当涅恰耶夫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巴枯宁即同他断交,并提醒自己的朋友要疏远涅恰耶夫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物”,他是“恶棍”“狂热之徒”,“很危险”“不守信用”^[3]。

《革命者手册》包含的道德原则反映在革命者如何对待自己、对待革命同志、对待社会和人民上。所有这些态度集中于对革命主要目标的看法,为了达到目标可采用任何方式。为了伟大的目标,一切手段皆无罪的说法是狡诈道德原则的基础。确定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时,涅恰耶夫写道:“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

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4]473}他们没有个人财产,是为了不被世俗世界利益所左右。他们应当是无弟兄的,应该与亲人断交,甚至关于自己的母亲也必须说她死了,即使她还健在。涅恰耶夫所说的革命者与“丑恶社会”相对抗,对社会而言他是无情的敌人,只知道破坏的科学。为了达到无情破坏的目的,革命者可以而且应该常常假装成与他的本来面目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社会上。“革命者应该潜入一切地方,一切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店铺、教会、贵族家庭、官僚界、军界、文艺界、第三厅(秘密警察机关),甚至潜入皇宫。”^{[4]474}革命者对社会的类似态度导致对先前道德规范的否定和颠覆。对他而言,凡是促使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合乎道德的;而凡是阻碍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一切亲情、友情、爱情、感激等温柔脆弱的感情都应该被唯一的革命事业的冷静激情抑制下去。革命者应该将社会分成几类人:应当立即判处死刑的人;只是暂时让他们活着,为革命所需并能激起极端行为的人;为数众多的愚蠢却身居高位的人;沽名钓誉者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爱在小团体内和纸面上大发空谈的教条主义者、秘密工作者和革命者;最后还有妇女。

为了既定的目标而允许一切手段,这使《革命者手册》与耶稣会的条令极为相似。按照涅恰耶夫的手册,革命者是怎

皇政府利用《革命者手册》来证明那些感染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的形象,而且在《政府文件》(1871. NO. 162)中刊登了“涅恰耶夫案件”的速记材料。报刊首先获得了讨论这一案件的权利。反政府反社会的道德原则应该会引起社会的反响。谢德林在《这就是所谓“涅恰耶夫案件”及俄国杂志对它的态度》一文中描述了报刊的反应。俄国革命者在社会面前被视为无耻的骗子,是没有信念、无原则、无荣誉的微不足道的人^[5]。

无疑,为了与为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保持一致,革命者被迫放弃一些责任、个人习惯及与亲人的交往。但是革命的忠诚被涅恰耶夫发展成了谬论。如果在十二月党人的幸福协会条令中,为祖国服务被视为仁爱、善良、高尚,那么涅恰耶夫的革命者,则是一切社会的无情敌人。他在邪恶世界只看到唯一的同盟者——强盗,认为他们是俄国典型的革命者。

为了更完整地描述俄国解放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阶段革命家所创制的道德原则,还必须关注民粹派。平民知识分子在19世纪70年代的运动经历了新的高潮。如果说60年代的革命家指望人民革命的话,那么70年代的民粹派则反对革命斗争。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大学城出现了民粹派小组,以培养未来的革命家为目标。这要求创造出某种共

同准则,但记忆中还有“涅恰耶夫案件”的新鲜事实。作为对涅恰耶夫原则的反抗,最初的民粹派小组人数很少,他们拒绝制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论证严格纪律的必要及服从中央领导的条例。对涅恰耶夫分子的否定态度使他们努力建立基于各成员亲密相识、完全信任且平等的组织。他们认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是所有人完全平等。土地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违背自然法的行为,要为世界所有人的平等而斗争。但他们又同时认为争取公正可能需要流血,这种情况下杀人这一行为对自然法的破坏可以是无罪的。

经历了“到人民中去”的喧嚣而幸免于被捕的革命家组成了“全俄罗斯社会革命组织”。虽然它并未未来得及成为全俄罗斯的,但加入其中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要继续在人民中宣传,继续同专制作斗争,需要强有力的革命组织。

创建于1875年末的名为“人民公社”(1878年改名为“土地与自由社”)的民粹派组织颁布了自己的条令,规定了组织的目标是与专制作决定性的斗争。因此革命者的义务,要求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同志间相互监督、服从大多数。南俄工人联盟(1875年)的条令指明要唤醒还不壮大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批判当时的社会体制,阐明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角色以及在所有劳动者面前的道德义务,明确了革命者与联盟的关系,形成了无产阶级道德中最重要的原则——“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以及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

革命”的报告中评价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以自己的英雄恐怖斗争手段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无疑,这些牺牲并非徒劳,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对以后的俄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教育,但他们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直接目标——唤起人民革命。”^[6]

三、无产阶级运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期间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并集中于大型企业。无产阶级队伍在周边国家的形成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极少的工资,繁重的工作条件,缺乏政治经济权利,这些都使得工人奋起斗争。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工人阶级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力量。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工人“是唯一走到最后的革命阶级。他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斗争并第一次组织了数百万农民走向公开的革命斗争”^{[1]261}。

所有新的工人阶级群众都参加了罢工运动,说明无产阶级的道德意识有了大的改变。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赋予了工人的行为以政治特征。19世纪90年代末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进行的大量宣传促使无产阶级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形成。1905年1月事件使得未觉醒的工人意识到自己的消极和政治冷漠,他们随着革命的展开而成熟,走向团结和组织化。当广大的工人、农民、士(下转第96页)

- [3] 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266-274.
- [4] 陈平原.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 第 1 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114.
- [5] 黄林. 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6] 阮恒辉. 我国近代文学期刊编目[J]. 文献, 1979(2): 244-258.
- [7] 郑逸梅. 书报话旧——郑逸梅作品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 陈大康.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7.
- [9] 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 大华出版社, 1971.
- [10] 宋原放, 李白坚. 中国出版史[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1: 243.
- [11]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87.
- [12] 方卿. 图书营销管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7.
- [13] 唐振常. 上海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730.
- [14] 张仲礼.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1840—194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925.
- [15] 李今.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312.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 56 页)

- [41] 程大昌. 华清官图·温泉说[M]//雍录: 第 4 卷. 黄永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83.
- [42] 地理二·河东道·潞州[M]//刘昫, 等. 旧唐书: 第 39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476.
- [43] 宋敏求, 李好文. 县六·醴泉[M]//长安志·长安志图: 第 16 卷. 辛德勇, 郎洁, 点校.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 493.
- [44] 百官上·十六卫[M]//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 第 49 卷(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281.
- [45] 地理一·关内道·华州[M]//欧阳修, 宋祁, 等. 新唐书: 第 37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64.

(责任编辑: 白丽娟)

制, 并建立人们之间新的公平公正的关系,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可以看到, 面临社会变革的任务, 各阶级、社会团体都制定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 这些对革命家的行为要求首先反映了参与革命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纲领、目标、斗争方式。令人惊讶的是, 我们发现, 整个革命史中对人个体及生命价值的轻视态度在逐渐增长。十二月党人走出参议院广场, 用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冒险, 拒绝人民流一滴血, 平民知识分子试图达成期望的人民革命, 为了实现目标准备牺牲部分人的生命, 无产阶级运动则将人民大众引入革命进程。这样, 人的生命渐次暗淡和贬值于伟大的目标。

革命的道德原则引导我们面对一个对人类今后时代而言如此紧迫的问题——人类活动的目标与方式的关系。因为矛盾是难以根绝的, 按照辩证法, 这是发展的结果, 人类不得不永远寻求解决问题的智举。

- [1]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1[M]. М., 1960.
- [2]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декабристов: Т. 1[C]. М., 1951.
- [3] 李显荣. 巴枯宁评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2: 9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5] 周厚琴. С. Г. 涅恰耶夫与 19 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恐怖主义[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 [6]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0[M]. М., 1960: 315.

(责任编辑: 李秀荣)